《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曾给广大抗战军民以巨大激励，它的旋律如黄河涛声，一直澎湃在一代代革命军人的心中——

每当唱起“黄河之滨”

■雷从俊

激荡灵魂的声音
经典抗战歌曲回眸

午后抵达南京，我按照《录取通知书》的提示，找到了“鼓楼区挹江门街道中山北路252号”。当年我梦寐以求的这所军校，如今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的一个教学区。当天下午，我和短训班的同学们一边走报到流程，一边熟悉校园环境。望着绿荫之中高耸的教学楼，一种久违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第二天一大早，随着清脆的哨声，我和同学们迅速起床下楼，准备列队集合参加早操。这时，校园广播传来雄浑激越的歌声：“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听着这熟悉的歌声，我顿时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这地方，无疑是长江南岸，而歌里却唱着“黄河之滨”。从祖国各地集合在这里的新时代革命军人们，聆听着一首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歌曲，即将开始他们的早操。

虽然这首《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旋律那一刻正沐浴着长江之畔的暖风，但它的每个音符、每句歌词，都与千里之外的黄河有着不解之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连续突破湘江、乌江、赤水河、金沙江和大渡河，跨越了险象丛生的雪山草地，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古老的黄土高原沸腾了，黄河向着从远方跋涉而来的队伍张开了母亲般的臂膀。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由保安迁往延安。这座陕北小城，成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延河流水光闪闪，战士饮马走河边……革命征途千万里，毛主席指路红旗展……”延河，作为黄河中游一条著名的支流，流淌着艰辛也流淌着荣光，流淌着苦难也流淌着辉煌。

伴随着形势的发展，刚刚迁至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时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委员的毛泽东同志，亲自制定了教育方针和校训。为了激励学员们刻苦学习军政课程，肩负起抗日救国的重任，他还提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凯丰为抗大写一首新校歌，以取代原来的《红大校歌》。

凯丰接到任务后激动难抑。面对党中央赋予抗大的重任，看着一批批朝气蓬勃的革命青年，他心潮澎湃，文思泉涌。很快，他将这份从心底流淌出的歌词交到青年作曲家吕骥手中。吕骥手捧歌词反复吟咏，内心激荡不已，澎湃的乐思挟裹着炽热情感奔涌而出，仅用短短一个下午，就完成了谱曲工作。歌曲以黄河母亲之名，召唤中华儿女团结奋起，“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这首歌，歌词参差错落、气势磅礴，曲风刚劲有力、雷霆万钧，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感召力，很快从校园传遍延安，飞越万水千山，唱遍抗日前线，并一直传唱至今。

我最早知道这首歌，是在它诞生50多年后的1992年。那年冬天，刚刚穿上军装的我和战友们一起，从黄河故道以南的豫东平原出发，前往东北军营。火车上，几首优美的流行歌曲过后，突然响起了铿锵有力的旋律，其中就有这首以“黄河之滨”开头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对于这首几十年前的老歌，当时绝大部分新兵不太熟悉，我也没太注意，只知道火车正途经松花江畔的哈尔滨，向东一路奔驰。

我最早唱起这首歌，是在1996年。这年9月，我从驻守在林海雪原的军营考入位于长沙的一所军校。庄严的开学仪式上，有一项议程是“全体起立，唱《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当时我还记不住歌词，只是跟着旋律哼唱，内心还有点疑惑。明明是在湘江边上，怎么唱着“黄河之滨”呢？后来才知道，我们学校原为东北军政大学和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总团合并组成的华中军政大学湖南分校，而东北军政大学的前身，就是1945年10月向东北挺进的抗日军政大学。这么说来，“黄河之滨”正是一代代军中学子显著的精神坐标。深入学习校史后，我还了解到，当年的抗大先后在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创办了十几所分校。伴随着抗大毕业学员的足迹，这首歌在抗日根据地广泛流传，深深激励着广大抗战军民。

这些年，我在湘江边的军校唱过它，几次到其他军队院校参加培训也唱过它，在军营歌咏比赛中听过它，在天安门广场盛大的阅兵活动中更是领略过它青春激扬、无往不胜的艺术魅力。

当年，抗大学员在歌声中走出菁菁校园，从“黄河之滨”出发，加入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战斗的伟大事业中。此刻，当我在长江南岸的军校里，再一次情不自禁地唱起“黄河之滨”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知不觉间已走进抗战的血火，与前辈们的情感融为一体。在歌声里，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黄河似乎早已相互交融，澎湃着共同的情感，激扬着同样的气概。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黄河浪涛滚滚，而不远处的长江也在我的耳际澎湃起来……

岁月长歌

胜利的方向

■顾中华

田园的宁静 被枪声划破
那一年侵略者用刺刀掀开
中国版图的东北一角
一首悲怆的歌曲
和方言一起到处流浪
棉花 大豆和高粱
成为刻骨的乡愁
战争爆发
山河陷入漫漫长夜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延安
从未把自己当作一座孤城
黄土高原上 思想的闪电
正在劈开道路
窑洞里油灯闪烁 辉映着
天上的北斗星
宣言 是呐喊也是旗帜
八天九夜写就的《论持久战》
标定出胜利的方向和时间
是预言 也是真理
是信心 也是力量
每一个字都立在纸面上
保持冲锋的姿势

大义扛在肩上 摘下八角帽
红五星 依然在心底闪耀
脚下的土地
还有这上面的一切
值得舍去一切去保卫
一缕春风 开遍原野的鲜花
无言的庄稼
也包括天空的晴朗
未来的明亮
八路军 新四军
成为最响亮的新名字

从白山黑水到江南水乡
南方和北方 没有了界限
从平型关到黄土岭
所有的枪口都瞄准敌人
地道战 地雷战 游击战
让敌人深陷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根据地 沿着胜利的方向
结出一枚枚硕果
喜悦的歌声
响彻每一寸山河
也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反复回响

文艺战士抗战亲历

前边打，后边演

■战斗剧社 刘西林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120师主力一部奉令挺进冀中，战斗剧社随师政治部同行，通过同蒲、平汉两道封锁线，于1939年1月经由晋察冀边区进入冀中平原。

我们一进冀中，正遇到敌人对冀中进行第三次围攻，我们的部队立即投入战斗。这时战斗十分频繁，一仗接一仗，几乎每天都要打仗、每晚都要转移，经常和敌人相距只有一二十里。但我们仍利用战斗间隙，想方设法为广大军民演出，并新排了7场歌剧，编演了新的舞蹈《平原游击队》等。不久，为了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部队首长决定大部分后勤人员撤到冀西山地，战斗剧社也随留守处和教导团转移到晋察冀边区灵寿县陈庄镇附近驻扎。

晋察冀边区也不是太平世界，经常有敌人“扫荡”。为了更好地适应战斗环境，剧社开始进行军事训练，我们从瞄准、刺杀、投弹到侦察都学习了。

在这期间，我们利用战斗间隙在张家庄、城南庄一带进行多次巡回演出。特别是陈庄战斗中在火线上的演出，至今令我记忆犹新。1939年9月中旬，边区人民正在准备过中秋节，敌人乘机奔袭陈庄镇，扑空后迅即撤退。这时，贺龙师长已经带领主力部队从冀中来到路西，并和晋察冀一个团出敌不意地把撤退的敌人团团包围起来。战场就摆在离我们不到半里路的冯沟，我们很多同志就趴在村边土梁上观察战场情况。这时，贺师长给我们传下话来：“要搭起台子，放开胆子，好好演戏！”周士第参谋长亲自指示我们，要把顶好的戏都拿出来，战斗部队轮流下来看戏，“前方后方比赛”。

就这样，前边打，后面演。贺师长等首长别开生面的安排，大大鼓舞了部队的战斗热情。战斗打了6天5夜，剧社一直演到胜利结束战斗。这次演出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艺术的战斗作用，我们本身也受到很好的锻炼。

我们在晋察冀边区的8个月时间内，在创作上取得了很大收获，改变了依靠外来剧本的局面，开始自己动手编写反映现实斗争的剧本，并获得成功。这些剧目的演出，受到了边区人民的欢迎，他们说：“这戏演的是咱自个儿的事，一看就懂”“这戏演到点上啦，我们爱看”……

（标题为编者加，文章摘编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画外音

这幅油画描绘的是白马连在南鲍墟村英勇战斗的瞬间。1942年5月下旬，冀中军区骑兵团白马连于河北蠡县南鲍墟村遭日军伏击。官兵沿河堤血战突围，8名勇士壮烈牺牲，主力成功迂回晋察冀根据地。在创作时，我以对角线的动态趋势构建出战斗场面——白马连战士自画面左上方向右下方冲锋而出，如同一道白光劈开阴霾。画作表现的不仅是战争的残酷，更是那些平凡生命所迸发出的惊人勇气。我想，这束光，能穿透画布直抵人心，成为令人震撼的生命回响。

冀中骑兵团白马连（油画）
赵大千作

走近抗战英雄

铁道雄风

■许 晨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

那还是在小学时代，全班同学集体前往影院观影。当灯光渐暗、旋律响起时，大家立即沉浸在那爬火车、打鬼子的画面中。这部改编自刘知侠同名小说的电影《铁道游击队》，生动展现了鲁南抗日根据地军民英勇斗争的壮烈史诗。

歌声飞越四季，后来我踏入火热的军营。在一次写作培训班中，我有幸聆听了时任山东省作协主席刘知侠先生的授课，听他生动讲述这部作品背后的故事。

小说中智勇双全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其人物原型融合了首任大队长洪振海和继任大队长刘金山的事迹。文学创作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作家从两位大队长的姓名中各取一字，成功塑造了“刘洪”这一战斗英雄的经典形象。

1910年，洪振海出生在山东滕县一个贫寒农家，自幼在枣庄铁路边生活，练就了飞登火车的本领。七七事变后，洪振海目睹日寇暴行，十分愤慨，便毅然加入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由于他作战勇猛，很快当上了排长，成为鲁南抗日武装的骨干。

1939年10月，鉴于洪振海对枣庄地形民情十分熟悉，总队研究决定委任其为枣庄情报站站长，并着重强调需尽快获取武器装备。正在火车站干活的战友王志胜，恰在此时带来重要情报。

这日傍晚，王志胜风尘仆仆赶至秘密联络点，未及喝口水便急切汇报：“老洪，发现目标了！”洪振海立即追问：“快说说，在哪儿？”王志胜正是小说中副大队长王强的原型人物。他利用工作机会侦察到日军要运输一批军火，遂在车厢上做了标记。

当晚，洪振海携带手枪与虎头钳，隐蔽在铁路转弯处。待火车减速通过时，他飞身一跃，登上了火车。洪振海找到标有记号的车厢，用虎头钳剪开门上的粗铁丝，钻入车厢。当他扯开一捆稻草时，一挺机枪赫然出现。他迅速把机枪抛向路基，接着翻找下一捆稻草。

过了一会儿，火车突然响起“呜呜”的汽笛声——这是即将到站的信号。洪振海接连抛出数件武器弹药后，胳膊夹着一支枪飞跃而下。待命接应的王志胜等人抓紧清点搬运：一共有两挺机枪、12支步枪和两箱子弹。第二天夜里，这批武器弹药被运往义勇总队。

1940年1月，受八路军苏鲁支队命令，铁道游击队成立，时称“鲁南铁道大队”，任命洪振海为大队长，王志胜为副大队长，同时派遣杜季伟同志担任政治委员。这是一支威名远扬的人民抗日武装，人数最多时达300余人。他们活跃在千里铁道线上，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扒铁轨、炸桥梁，撞火车、截物资，杀鬼子、惩汉奸，护群众、保家乡，让敌人心惊胆战。

为彻底“剿灭”铁道游击队，日伪军专门成立了情报站，并训练了一支由特务头子高岗茂一指挥的特种小队，四处搜捕铁道游击队的行踪。面对敌人的疯狂反扑，铁道游击队决定先发制人。经过周密部署，1941年10月的一个夜晚，洪振海与杜季伟率领队员身着缴获的日军军服，在内线策应下突破封锁线，成功潜入临城火车站。

紧接着，王志胜和分队长刘金山直扑高岗茂一的住处。借助列车通过的轰鸣声掩护，二人迅速开枪将高岗茂一击毙。另一边，洪振海指挥队员将正在休息的特种小队队员悉数击毙，然后扛起室内的武器和弹药，悄然离去。战后，铁道游击队威名远震，日伪军更加恼羞成怒，疯狂寻机报复。

由于叛徒告密，1941年12月的一个风雪之夜，数百名日伪军突然包围了鲁南铁道大队驻地黄埠庄。洪振海在率部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1岁。

值得一提的是，洪振海牺牲时手腕上系着一条缝有镰刀和锤头图案的红布，这是他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

原来，当年洪振海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组织上为了表示对他的信任，决定将唯一一面小党旗交给他保管。洪振海牺牲后，鲁南军区政治部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样的英雄事迹，一定要让它流芳百世。”这个信念，始终萦绕在刘知侠心头。后来，他在向我们讲述创作历程时提到：“日寇投降后，铁道游击队举行第一次新年会餐。队员们将丰盛的酒菜摆放在牺牲战友的坟前，眼含热泪说出了两个心愿：一是在微山湖畔为战友树立一座纪念碑，二是希望我把他们的战斗经历写成书。”

历史不负英魂。经过多年深入采访，刘知侠于1954年创作出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铁道游击队纪念碑庄严落成。小说发表后，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其改编为同名电影，刘洪等队员们的英勇事迹感动了无数观众，影片主题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更是成为传世经典：“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铁道游击队雕像。

学术支持：褚 银
版式设计：方 汉、杨 磊、贾国梁